



曾国藩

政治方略

曾国藩◎著 常万里◎点评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功不獨居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国藩

智慧经典丛书

晚清第一名臣

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

曾国藩 政治方略

曾国藩 著 常万里 点评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政治方略 / (清) 曾国藩著；常万里点评.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4
(曾国藩智慧经典丛书)
ISBN 978-7-5438-9776-2

I. ①曾… II. ①曾… ②常… III. ①曾国藩（1811～
1872）—政治—谋略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686 号

曾国藩政治方略

编 著 者 曾国藩 常万里点评
责任编辑 骆荣顺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4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776-2
定 价 35.80 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躬自入局显拙诚	1
第二章	吞牙和血为功名	33
第三章	择友选才图经世	73
第四章	瞻前顾后稳为官	115
第五章	坚忍竭诚为朝廷	157
第六章	进退维谷为哪般	221
第七章	远虑近忧齐思量	261
第八章	钟鸣鼎食散一朝	299

第一章

躬自入局显拙诚

常言云：根深叶茂。这道出了一个道理：只要基础打牢了，就能取得相当的成就。成就学业如此，成就事业也一样；同样，在官场上也必须要根基稳，必须夯实为官之基。世人最倾慕的有两种人物，一为英雄，二为圣贤，有人言，曾国藩兼此二殊誉。他最大成就还在于他的道德文章、品学修养，这是他成就官场事业的根基。

君子之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
累月奔驰酬应，不失常理，
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

原典

（一）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策，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声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二）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科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

（三）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理，当可日进无已。人

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于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四）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衍面，孔彦曾盍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五）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的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一）细思古人修身功夫，其成效特别显著的大约有四方面：慎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恭谨慎，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敬慕热爱；正心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禁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如此，内省而无愧，成以心泰；主敬，就是说仪容整齐严肃，内心思虑专一，端恭不懈，所以说身体强健；求仁，就是从本体上讲，有爱民惜物之怀，大公无私，所以人悦；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无二，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感应万物，所以神钦。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之功夫，效验自然而至。我虽然年纪衰迈，但还想讲求此修身功夫，以求得万一之效。

(二) 古代的君子是怎样竭其心力、修养德行，我们是不能见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全部秉持的是礼。从内部来说，如果舍弃了礼就无所谓道德；从外边来说，舍弃了礼就无所谓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的书籍以《周礼》为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中通礼、善于游说辞令的人常常能够说服人，而使他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外表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也要讥讽的。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以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去追逐流俗。近代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的原貌。

(三) 每天每月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才能每天都有进步。人生惟有做事有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之道，也曾苦力探索，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不间断，就觉得有所进步。由此可见，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如种树养家禽一样，天天看着它长大而感觉不到。尽力猛行，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迟缓，举止端庄，则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峻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四) 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襟十分宽广，而达到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笃恭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这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这是孔子、孟子、曾子、颜回的至高宗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所在。惭愧自己少壮不知努力，年长时常常有一种悔惧萦绕于怀，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不能领略一二。反复寻思，叹喟不已。

(五)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

的，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俗话说的悲天悯人，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评 述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阶级家庭，科举入仕，数次升迁，位及二品，终成晚清第一中兴名臣，煊赫一世，均源于他的谨严的修身、驭学、内圣外王之道。

一、踏入仕途

“振极世风”、“匡时救世”是曾国藩进入仕途的人生目的。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年，曾氏殿试中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为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

为此，他同意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一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齷齪，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

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因此，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进取。

曾国藩自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在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

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敌对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得明白：

今回籍未几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虽在守丧之时，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欲投水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反复掂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近代爱国志士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國历史文化遗产的消化、吸收过程中，受到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的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二、澄清世风的高尚形象

在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中国，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

之际，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首先应当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使人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的规范去处世为人，去说话行事。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正是晚清社会危机的写照。于是，从自己做起便显得十分重要。他说：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竞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国藩不肖，亦谬谬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砢，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载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

很明显，曾国藩要以实际行动担当“救世”的重任，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为此，他也特别告诫其子弟，处世为人也好，居家旅行也好，读书做官也好，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统治，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于个人或家庭的利害得失，虽也应该考虑，但这只是次要的问题，应当服从于“匡时救世”的需要，并为之不惜一切，这才称得上正人君子，才算得上有远大抱负。

曾国藩以“匡时救世”为建功立业的抱负，以修身立德为达官做人的标准。在他看来，修己治国在有德，古代圣人正是如此，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为官办事，就在乎德行。从他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的五句箴言中，也可以看出他首先立志之说，要荷道以躬，要以己之身担当中国的道统，以德业求仕，追求成功。他曾给自己定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期望自己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把它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担天下大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不能使“修身”同“治国、平

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其中都体现着修身的大学问。

曾国藩把修身与治国、救世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精神修养。

曾国藩是按照中国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的，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曾国藩是具有中国儒学传统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修齐与治平是绝不可分的。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是他自己总结的“八德”，即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还经常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冷静权衡的平实态度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

正封建士大夫奸猾、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道。这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出，他认为，天地诞

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的境界。他认为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这样，神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藩对理学已有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作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入修炼，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的，还有他没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呢？为什么说人心叵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诚意”，有诚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话，就只能是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这也要显得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确实不真诚，另一方面他极力显示真诚，这就不能不说谎或伪装；他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唯一的审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问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于是，曾国藩对自己有了严格的“修法十二课”的条款：

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是否有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